

# 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 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3~55

2013 年 11 月 22 日

\*\*\*\*\*

## 和高行健結婚離婚

王學昀<sup>1</sup>

今日瀏覽網絡，無意中看到香港《蘋果日報》2012 年 12 月刊登的一篇文章〈高行健的元配夫人〉，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嚴家祺先生，自從搬過一次家後，我和他們夫婦好多年沒聯繫了，看到文章，講的都是過去熟悉的事情，勾起了我很多回憶。

20 世紀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，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鐘新村，當時那裡住的大多是專家學者、文化名人，其中就有把列夫·托爾斯泰鉅著《戰爭與和平》介紹給中國讀者的翻譯家高植先生，也就是高皋的父親。我們兩家是通家之好，高植先生是我父親的老友，他的太太是我母親的中學同學，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學念書，

---

<sup>1</sup> 原載香港《蘋果日報》2013 年 9 月 1 日 ( <http://hk.apple.nextmedia.com/supplement/apple/art/20130901/18403555> ) 。

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。現在還能回憶起我們住的院子裡常常舉辦文藝晚會，有一次，我們的媽媽和其他媽媽們一起身著俄羅斯服裝跳舞，爸爸們則把在院子裡掛上五顏六色的電燈泡，童年的記憶十分純潔、美好。

我於 1955 年 9 月就讀南京第十中學（現在的金陵中學），與高行健認識是在 1957 年 1 月學校舉辦的一次舞會上，高行健通過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學來找我，說希望我教他跳交誼舞。此後，放學路上經常會和他“巧遇”，和他比較熟悉以後，我憋不住好奇，問他學跳舞為甚麼不自己來找我，他說怕被我拒絕，並說很早就注意我了，因為經常在學校體育場看到我的身影，也去觀看過我參加朗誦比賽，在跟我接觸之前，他已經通過好幾位同學瞭解了我的家世。1957 年暑假開始後，我收到一封信，此前，除了收到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和比賽的獲獎通知之外，沒有人單獨給我寫過信，打開一看，竟然是高寫來的，欣喜地告訴我他被北京外國語學院錄取了。後來我考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，我們地分南北，主要是通過書信相互瞭解對方。文革爆發後，我的家庭也像許多教授家庭一樣受到衝擊，高那時已經大學畢業留在北京工作，利用出差機會回南京來看我，勸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風頭，我們於 1967 年 10 月在北京結婚。

高在中學時就表現了對文學的愛好，只要嘗試寫一點東西，就會拿來聽取我的看法，結婚以後仍然如此。從 1957 年到 1976 年，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，短的有兩頁，最長的有十頁紙，每一篇的內容情節至今還歷歷在目，不是醜化揭批右派分子，就是謳歌文革，其中有一篇他特別滿意，署上筆名“紅飆”，寄給了江青。

自 2000 年高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，有一種關於我們離婚原因的傳聞大為流行起來。據該傳聞稱，高的第一個妻子反感他一天

到晚不停地寫作，抱怨他直寫得家徒四壁，連孩子也養不活。傳聞還說，高在文革期間繼續暗中寫作，而妻子威脅他要向組織告發手稿裡有見不得人的東西，高怕因文獲罪，一邊掉淚，一邊把一整箱手稿燒個乾淨。關於這件事，我在這裡不妨多說幾句。

首先，傳聞的“作者”似乎沒有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生活過，高和我當時都有固定工作，拿固定工資，他愛不愛寫作、寫多寫少，都不影響家庭的經濟狀況，“寫的家徒四壁”不知從何說起。我們僅有的一個兒子出世後，從小到大一直寄養在南京我父母家裡，高沒給過一分錢生活費，直到離婚後才根據法院判決支付了三年的撫養費。文革中我父親工資被扣，母親沒有收入，我曾與高商量寄點錢回家，他卻說：“你爸爸養不起我兒子，我找你做老婆幹嘛？”

第二，這位傳聞的“作者”與我素昧平生，不知根據甚麼說我迫使高燒掉手稿？又是根據甚麼認定高當時有“一整箱的手稿”可燒？實際情況是，高在文革時期作為造反派頭目、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，多次對別人進行抄家、批鬥，還催逼我和哥哥燒掉了家藏的所謂“反動”書籍和海外親友的照片。

1975年，高以我父親女婿的身份找我父親的學生南楚珍推薦，從安徽農村調到北京的中國旅行社，之後又經過我母親的親戚龔普生（喬冠華太太龔彭的大姐）推薦擔任了《中國建設》雜誌社法文組組長。1979年，高陪同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到法國、意大利訪問，回國後首次跟我提到他對諾貝爾文學獎志在必得，說“巴金老兒不敢拿，我敢拿！”我當時很納悶：你手頭沒有甚麼作品，靠甚麼去拿這個獎呢？他也曾對我說，魯迅之所以拿不到諾獎，就在於作品太少，都是短篇的。不過就是從那以後，他的確把重心放到了寫作和加強與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來。

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 1980 年，他說：過去想方設法調我到北京解決兩地分居，現在終於搞清楚老是調不成的原因了，因為我的檔案裡給我父親的結論是“特嫌”（“特務嫌疑”的簡稱）。他還說：特嫌是永遠翻不了身的，即使表面上給平反了，實際上仍然受到嚴密監控，根據內部規定，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軍人，不能嫁黨員，不能嫁幹部的。“你怎麼偏偏就嫁了我，你是個完蛋了的人，可我還要發展，你幹甚麼揪著我這根稻草不放呢？”我反問他：“當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，怎麼這個時候變成了我偏偏要嫁給你？你利用我們家關係調回北京的時候，怎麼沒有嫌棄我們這個特嫌家庭？”

此前，已經有親朋好友告訴我他在北京有外遇，並說我精神有問題，夜裡磨刀要殺他，我還不太相信，看到他這幅嘴臉，我難忍心頭怒火：你有了別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，光明正大說出來不行嗎？何必要給我扣一頂“特嫌子女”的大帽子？聯想到他把許多歷史人物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兩條：一是“婚姻就是政治、愛情就是性”；二是“一切功勞歸於自己、一切錯誤歸於別人”，現在竟把這兩條經驗全用到了我身上，作為有自尊的女人，我感到受了極大的侮辱。

在跟高離婚多年後，我曾努力忘掉這一段極不愉快的經歷，沒想到進入 21 世紀後，這段經歷竟然換了如此一副扭曲變形的面貌來回訪我，令我啼笑皆非。這麼多年來，我也曾試圖還自己一個清白，在友人們的幫助下發表文章，據說有的媒體根本拒絕刊登，有的網站登載了兩天又拿掉了，或者把涉及到離婚這部分的内容刪除不用，理由很簡單：這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，沒有辦法說清楚真偽，不能刊登一面之辭。

我很理解這些媒體的態度。第一，高是諾獎得主，我是平民百

姓，話語權不在我手裡，有人對我說：“捏死你就像捏死隻螞蟻”，生動地表達了這個意思；第二，高作為法籍華人獲得大獎，華人社會視為驕傲，重提舊事有傷驕傲，實屬自討沒趣；三是少數人可能覺得“妻子告丈夫”最能體現共產制度的邪惡性，寧可信其有。理解了這些，以後再有人找我詢問高從前的事，我一概採取“沉默是金”的態度。

雖然如此，我還是很感謝〈高行健的元配夫人〉的作者還原了當時的一些實際情況，並祝老友夫婦身體健康，生活快樂！

## 高行健的元配夫人

嚴家祺<sup>2</sup>

高行健是 1988 年開始定居巴黎的，1989 年“六四”後，我與我老婆高皋從北京經香港來到巴黎。我們與高行健早就認識。法國文化部授予高行健“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”那天，我與高皋到巴黎第九區“作家與作曲家協會”參加了高行健的授獎儀式。在巴黎期間，我們與高行健有多次往來，發現高行健的女友，與他的元配夫人王學昀有一些相同的地方，可以說是一個“類型”。這樣就引起我老婆對王學昀的許多回憶。王學昀家和高皋家是世交，她們是小時的玩伴、小學同班同學。早在 20 世紀 70 年代，王學昀就曾對高皋說，高行健自命不凡，他認為自己將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。看來，世上無難事，“為者必成，行者必至”。目標明

---

<sup>2</sup> 原載香港《蘋果日報》2012 年 12 月 23 日( <http://hk.apple.nextmedia.com/supplement/apple/art/20121223/18110663> )，發《參閱文稿》時作者略作修改。

確、堅定不移、專心致志，是成功的要素。

在高行健出國前，在 1974 年，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，而王學昀在南京。1981 年初冬季節，當時我家住在社科院乾面胡同宿舍。晚飯後，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，我打開房門，看見站在門口的王學昀。我叫著高皋，說“王學昀來了”。高皋有點吃驚的嘟囔著“她怎麼突然從南京來了”，立馬迎上來，看見只有王學昀一人，一面說，“怎麼就你一個人，高行健呢？！”，一面趕緊把她讓進屋來。只見王學昀穿著厚厚的大衣，呆呆地站著，面色煞白，手裡攥著一張紙，眼淚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。高皋上前摟住她，問到，“怎麼啦？……”忍了半天，王學昀才舉起手中的紙，蹦出一句話“他突然寫信來，要和我離婚。”高皋說，“找他去！找他去！”拽著王學昀，抄起外衣就衝出去了。

我焦急地等著，直到晚上 11 點多鐘，高皋回來了，樣子平平和和，歇了口氣，開口道：“你猜高行健住在哪裡，就在東總布胡同文化部宿舍，原來的傳達室，一張單人床、一張書桌、一個取暖用的蜂窩煤爐就把屋子佔得滿滿騰騰。高行健坐在書桌後邊，我和王學昀緊貼著門擠坐在凳子上，隔著爐子和他面對面。他們倆面無表情都不開腔，我只好東拉西扯，看見床上一大鐵桶餅乾，就問怎麼這麼多餅乾，高行健則面無表情喃喃回道，有時幾天不出門，就吃點餅乾……反正是勸‘和’不勸‘分’。我自覺沒趣，時間也太晚了，說了聲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沒等我開門，王學昀站起身說要跟我一起走。我趕忙攔著她說，這是你自己的家，怎麼能跟我走，把她往回推，徑自開門，就回來了。”

後來聽王學昀講，那天晚上，他們兩人溜溜地坐了一夜，一句話都沒說。看來，高行健是鐵了心，一定要離婚。

高行健和王學昀的相識，還算是浪漫的。

王學昀祖籍安徽，父親王氣鍾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，中國古典散文學家。她和高行健都就讀於南京金陵中學，相差四屆。高行健高三時，希望在跨進大學前能找到一個女友，看中了身材高挑、眉目清秀、文靜穩重、出身於教授家庭的學妹王學昀，利用上學放學同路的機會，有意與她接近，逐漸確立了戀愛關係。

高行健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後，分配到外文局工作。

1967年，王學昀還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，利用文化大革命大串連的機會到北京與高行健會面。王學昀說，當時大學生是不准結婚的，但是，在高行健執意堅持下，還是把婚結了。不久，王學昀的父親被打成“特嫌”、關進牛棚。

1968年，王學昀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廠當工人，工廠在大山裡，全是農民工，連報紙都看不到，沒紙、沒筆，王學昀誇張地形容，離開時連字都快不會寫了。其間，高行健欲將妻子調至幹校團聚，因王父問題尚未解決，沒有調成。1970年，他們的兒子王成至（小名毛毛）出生。為解決分居問題，高行健設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寧國縣港口中學，王學昀教書，高行健擔任政工組組長、革委會委員，被評為“學毛選積極分子”並加入了共產黨。寧國縣非常偏僻，傳說連日本人都沒去。當時正值備戰時期，情勢緊張，他們就想找一個能躲避戰事，又有柴、有米、有水的地方，先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問題。王學昀教學工作繁重，把兒子寄養在父母家中，生活環境和經濟條件都優於他們，不要高行健負擔養兒費用。高行健心裡明白，曾對王學昀戲言，“你爸爸養不起我兒子，我找你當老婆做甚麼？”

寧國縣不是久居之地。1974年，高行健以王氣鍾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，他是王氣鍾的老朋友，剛剛被解放的官員。當時，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語人才，有法語專長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

幫助下，被調進外文局國際書店《中國建設》雜誌社，王學昀仍留在安徽。

高行健一直想方設法要把妻子調回北京，還曾親自跑回寧國縣辦理，卻屢屢失敗。

70年代末，高行健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工作。此時，王學昀的父親已被解放，因身邊無子女，於1979年將女兒調回南京大學留學生部任教。高行健夫妻雖然都離開了窮鄉僻壤的寧國縣，卻仍然分居兩地。王學昀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團聚，她父母也有時隨行，順便看望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長子王學莊，高行健經常跑前跑後幫忙照應。高皋當時在北京一個小醫院工作，高行健為了讓王學昀在北京多待幾天，就以生病為由要高皋幫王學昀開“病假條”。高行健則一有時間就回南京看望妻兒。

好景不長。從高行健正式提出離婚起，夫妻之間便形同陌路，而王學昀堅持不離，一直拖到1984年法院判決。高行健負擔兒子每月16元撫養費。1987年，高行健去國後，他們之間的經濟聯繫就中斷了。離婚對王學昀的打擊很大，提起來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，像變了個人似的。

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，高皋與王學昀通電話，得知王學昀以副教授的身份已從南京大學退休，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，幫忙照顧兒子。王學昀談了高行健的家史，又談了毛毛的情況。毛毛取名“成至”，是“為者必成，行者必至”的意思。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徵，從小喜歡臨摹名畫，功底頗深，足以亂真，因為沒被美院錄取而就此封筆。毛毛一心向學、外語極好，在得到博士學位後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所工作。高皋說，從電話中可以感覺到，毛毛忠厚老實，懂事孝順，性格更像媽媽。